

# 翁同龢和帝党

汤志钧

翁同龢是帝党的领袖，帝党是拥戴光绪改革的政治集团。甲午、戊戌间，翁同龢“憾于割台，有变法之心”，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合作，推动了光绪“诏定国是”。晚近对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活动颇多论列，而对翁同龢和帝党的作用却很少涉及。本文即拟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帝党源自“清流”。中法战时，李鸿藻、张之洞、张佩纶、黄体芳、陈宝琛等“清流”中坚指斥时政，震动朝野。然而，随着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以“失败”遭斥，“清流”随之解体。

1887年，光绪“亲政”，一些官僚、文人、名士不满后党腐朽，以拥帝相标榜。在过去的“清流”中，有拥帝的，也有游移观望，主张“旧学为体”的。“清流”有升沉，人员有变迁，翁同龢竭力接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，发展为帝党。

帝党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，以为中国遭受侵略是由于“内政不修”。他们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，以“延揽新进”为救时要件，利用科举考试，拔擢人才。文廷式、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“人才”，他们也就成为帝党的中坚。

就在光绪“大婚”，册封瑾嫔、珍嫔那年，文廷式来京，文与盛

昱、黄绍箕、王仁堪、王仁东等本有“清流”之号，又和瑾、珍二嫔的胞兄志锐、志钧相友善，早为翁同龢所注目。到京不久，帝党沈曾植、沈曾桐就专门招饮，同座有张謇、郑孝胥、叶昌炽等<sup>①</sup>。九月，吏部请考内阁中书，由徐桐、翁同龢、李鸿藻、汪鸣銮主试，文廷式的考卷经汪鸣銮推荐，翁同龢也很赏识，说：“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乎”？徐桐并不同意，翁同龢力争，“持之良久乃定”<sup>②</sup>，取为内阁中书第一名。文廷式随即谒见翁同龢。次年，文廷式再度北上，偕同张謇往谒翁同龢<sup>③</sup>。中式恩科贡生，由户部引见，复试一等第一名，殿试第一甲第二名，赐进士出身。光绪看到文廷式的试卷，说：“此人有名，作得好”<sup>④</sup>。他知道文廷式“有名”，不是出自瑾、珍二嫔的推荐，就是由于翁同龢的介绍。文廷式授职翰林院编修，旋充国史馆协修、会典馆纂修、本衙门撰文，成为帝党的中坚。

张謇也是翁同龢早已注视的人物。19世纪70年代末，张謇还在吴长庆军中充当幕客时，翁同龢就加垂注。张謇科试时的江苏学政夏同善及其继任黄体芳，都是“清流”前辈。这样，张謇也想跻身“清流”，只是还未获得进入这个行列的社会身份。1885年，张謇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又结识了黄绍箕、沈曾植、盛昱、丁立钧等，这些人都是翁同龢、潘祖荫门下的“清流”名士。乡试发榜，张謇被录取为第二名。他在《自订年谱》中说：“九月十一日，听录中第二，潘、翁二师期许甚至。翁尚书先见予优贡试卷，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远，访余于庙。余一答谢。潘师命为乡试录其序，翁师命为后序。”翁同龢对张謇“期许甚至”，此后，翁同龢一直利用手头的录取权力，想把张謇中为进士，都未成功。直到1894年，张謇又参加会试，殿试时，收卷官黄思永等候张謇缴卷，即“送翁叔平相国阅定，盖知

① 叶昌炽：《缘督庐日记钞》“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七日”。

② 《翁文恭公日记》“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”；“光绪十五年九月初一日”。

③ 同上书“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三日”。

④ 同上书“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”。

张为翁所拔赏之门生也”<sup>①</sup>。翁以为“文气甚古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”<sup>②</sup>，竭力拔擢，张謇遂得“大魁天下”。“引见”时，翁同龢还对光绪说：“张謇，江苏名士，且孝子也”<sup>③</sup>，目的使光绪留下印象。张謇因翁同龢的大力援引而取得“清流”的社会地位，竭智尽忠地投入帝党怀抱，帝党也得到一位重要谋士。

翁同龢注目“清流”，宏揽名士，以至引用新进，汇成帝党，予晚清政局，频起波澜。

## 二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发生，翁同龢和帝党极力主战，并集矢对准军统帅李鸿章进行攻击。

从《翁文恭公日记》中，可以看到翁同龢等对中日战争的态度。兹将1894年8月1日中日战争爆发到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有关材料简述如下<sup>④</sup>：

8月17日，翁同龢在军机处看到李鸿章“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”，“力言俄不能拒，亦不可联，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，勿盼外援而疏本务”。

9月16日，平壤失守。次日，翁同龢攻击李鸿章，谓“合肥事事落后，不得谓非贻误”。

9月17日，黄海海战爆发，北洋舰队损失惨重，翁同龢深感“鸭绿江一线可危，即渤海亦可危”。

9月21日，翁同龢建议“宜调东三省兵，而急设大粮台，派大员经理，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”。

10月14日，翁同龢听说英使欧格讷提出各国联合促使中日

① 王伯恭：《螭庐随笔》。

② 《翁文恭公日记》“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”。

③ 同上书“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”。

④ 以下均见《翁文恭公日记》第三十三至三十四册，不另一一加注。

和议，而日本需索取兵费，极为愤懑，当着慈禧“指陈欧使可恶”，主张继续抗战。

10月31日，翁同龢进见光绪皇帝，“力陈京师陆危情况，请勿再迟一刻”。

11月3日，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。8日，知金州已失，旅顺危急，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，22日，旅顺失守，翁同龢“愤虑填膺”。当清政府派使赴日议和时，翁同龢仍主张征集湘军，以刘坤一为统帅，清政府采其议。

1895年1月10日，盖平失守。14日，翁同龢自称：“臣于和议，向不敢阿附，惟兹事亦不可中止，使臣已遣而逗留，恐彼得藉口，且我之议和，正欲得其贪吻所出，先作准备耳，幸少留意”。并提出：“悬破格之赏，不次之迁，以作将士之气”。

1月25日，日军在荣成湾登陆。30日，威海卫南帮海陆炮台失陷，翁同龢感到“大局糜烂矣，焦灼愤懑，如入汤火”。

2月2日，威海卫与北帮炮台尽失，翁同龢“愤极愧极！”谓“寇深矣，若之何”？

2月13日，清政府以李鸿章为议和头等全权大臣。22日，光绪皇帝接见李鸿章时，孙毓汶认为“必欲以割地为了局”，翁同龢力“持不可”。

3月2日，李鸿章谈及割地，翁同龢坚决反对，以为“台湾万无议及之理”。

4月3日，翁同龢从李鸿章来电中得悉“和约”内容，“胸中磊块，未易平矣”。次日，得知光绪帝期望议和速成，再次“力陈台不可弃”。说是如割台，“恐从此失天下人心”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又“极言批准之不可速”。

5月2日，清政府批准《马关条约》，17日，翁同龢见台民公电，“为之流涕”。

由上可知，翁同龢在甲午战时是主战的，马关议和时是反对割台的。

非但如此，他还和张謇、文廷式等关怀时局，讨论战备，密谋对策。如提出：派海军游弋中国、朝鲜、日本间，伺隙进攻，使日本“不敢分兵扰我边海”<sup>①</sup>；“请明发谕旨，对日宣战”<sup>②</sup>。

主和、主兵，后党依靠的是淮军首领李鸿章，帝党就集矢攻击李鸿章。7月底，张謇建议严惩李鸿章。8月中旬以后，随着战局的恶化，翁同龢与沈曾植、沈曾桐、丁立钧、黄绍箕、文廷式、张謇等频频密议。8月3日，先由志锐出面，奏劾李鸿章衰病昏庸，请求另行“简派重臣至津督师”<sup>③</sup>。两天以后，长麟等再次抨击，要求撤换淮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。9月，黄海海战失败，战火延入东北边境，人们把愤怒集中在李鸿章身上。在“群议沸腾”下，清廷不得不发出给李鸿章“拔去三眼花翎，褫去黄马褂”惩罚的上谕。

翁同龢认为“将不易，帅不易，何论其他”<sup>④</sup>？和文廷式、张謇、丁立钧等商议，酝酿联名奏请起用奕訢。9月27日，张謇与盛昱等在山西会馆会议，翁同龢且向光绪提出。次日，翰林院集议于全浙会馆，起草请求重新起用奕訢的奏议，列名者57人，对后党发动攻势。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记：

廿八日（9月27日），木斋晨来，约联名递封事，请起用恭邸，因昨日内、上两斋先入告，伯葵前辈召对，圣意欲得外廷请，臣协力言之也。

廿九日（9月28日），同署诸君集议于全浙馆，道希属稿，列名者五十七人。

木斋，李盛铎；道希，文廷式；伯葵，陆宝忠，时为侍读学士，入直南书房。陆宝忠自己也有一段起用奕訢内幕的记载：

自甲申更换枢臣，十年来专以恒舞酣歌为事，强邻虎视，主人翁熟寐不知。春、夏间，以朝鲜事与日本齟齬，激而开衅，仓卒征兵，漫无节制。中秋后警报叠来，予与禁秋入直后，互论国事，以为欲挽艰危，非亟召亲贤

① 张謇：《致翁同龢密信》二，应发于光绪二十年六月上旬。·

② 张謇：《致翁同龢密信》六，应发于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。

③ 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。

④ 《翁松禅致张亩庵手书》。

不可，愿以资浅言微，恐不足以动听，踌躇数日。八月二十七日清晨，至万喜侧直庐，与曹竹铭同年、野秋往复相酌，谋诸李若农前辈文田，若老忠义奋发，愿不避谴责，联衔入告，即与同志诸人到若老宅，由伊定稿，即日缮写，傍晚封口，明晨呈递。列名者为李文田、陆宝忠、张百熙、张仁、曹鸿勳、高庆恩。二十八日入直，宝忠独蒙召对，所宣示者不敢缕记。临出，上谓吾今日掏心告汝，汝其好为之！退至直庐，即往谒徐荫老，荫老约同志拟折，列名只数人。翰林科道皆有公折，翌日同上。又次日，上召诂南、上两斋之未列名者令其补递。于是传知宗人府，令恭亲王预备召见。<sup>①</sup>

可知奕訢的起用，是经过光绪和帝党的内外配合的。

奕訢起用没有几天，丁立钧领衔联合翰林 35 人上《请罪李鸿章公折》<sup>②</sup>，张謇又单衔上折，说：“李鸿章既自负善和，必且幸中国之败，以实其言之中；必且冀中国之败，而仍须由其主和，以谋其所挟之尊。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，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，展占相师”。“恐兵事一定，校论功罪，恩怨起于朝局，邪说祸及将来，此则迫切忧危而不得不为辨奸之论者也”<sup>③</sup>。斥责李鸿章“主和误国”。

帝党对李鸿章外交政策的抨击，多少反映了民间御侮图存的情绪，然而，帝党期望“扭转乾坤”的奕訢，起用后无所作为，连文廷式都说：“恭邸复用之后，惟设督办军务处，援宋庆帮办军务，余无所建白。……恭邸至冬间乃直军机，年又老，又叠经废置，且一时将相多非所习，遂因循焉。上始向之殷，久之乃竟不足恃，天下之望亦愈孤”<sup>④</sup>。帝党又想借助英、德以抗日本，10 月间，沈曾植、黄绍箕、丁立钧“申议联络英、德”，志锐奏请“联英伐倭”，文廷式更联合翰林 38 人上《奏请密联英、德以御倭人折》，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表

① 《陆文慎公年谱》卷上。

② 《参昏庸骄蹇丧心误国疏》，见草莽书生辑《谏止中东和议奏稿》，署名文廷式等。查《张謇日记》，记由丁立钧领衔。

③ 张謇：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》，《张季子九录·政闻录》卷 1。

④ 文廷式：《闻尘偶记》。

明了帝、后之间主战主和之争，也交织着英、俄、德、日之间在中国的争夺。

英国的联合“调停”没有实现，后党的求和活动公开化了，军机大臣孙毓汶、徐用仪，嗾使翰林院中一些人上书奕訢，请求“忍辱求和”。10月12日，张謇夜访翁同龢，“危言耸论，声泪交下”。次日，丁立钧、黄绍箕、沈曾植等商议“请分道进兵”。然而，纸上谈兵，没有能“动求和之心”，不当权的官僚在战争节节败北时，也只能坐视后党的放手求降。1895年4月17日，《马关条约》终于签订。

综如上述，中日战争时，“清流”蔚为帝党，帝、后两党的争夺政权在和战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。翁同龢和帝党主战拒和，攻击李鸿章，推引恭亲王，以致拒和约，反割台，在当时确有影响。但帝党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后党的斗争很是软弱。他们只是想从后党的控制下获取权力，并不敢与后党真正决裂；只敢对声名狼藉的李鸿章公开申讨，对实际掌权的慈禧却还要“察颜观色”。中日战争在怯懦的怨声中告终，帝党的“整顿”愿望也只能伺机再起。

### 三

甲午战后四年，发生了戊戌变法；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，但变法的实现，却是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，从而促使了光绪帝的“诏定国是”。

帝党对康有为是早有了解的：1888年，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，黄绍箕、沈曾植“实左右其事”，上书不达，沈曾植惋惜地劝康有为“勿言国事，宜以金石陶遣”<sup>①</sup>。翁同龢也已心仪其人，加以垂青。

改良派对主张“整顿”改革的帝党也争取团结。在中日战争中就和、战问题斗争激烈时，改良派明确主战，投靠帝党，梁启超在写给夏曾佑信中说：“前仆已托通州君，若相见时，可再托之，但得常

<sup>①</sup> 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“光绪十四年戊子，三十一岁”。

熟兄致电，其电话或由本人自定，或仆处代拟亦可耳”<sup>①</sup>。通州，张謇；常熟，翁同龢。他们想叫翁同龢劝说李鸿章抗战，设想很天真，但曾“托”过张謇，在主战这点上，有着与帝党联合的政治基础。

由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，帝党中一部分人逐渐倾向变法；改良派也寻求支持者。帝党要利用改良派的变法才能和勇气，改良派也想利用帝党的地位以扩张声势。这样，甲午战后，帝党和改良派就逐渐结合了。

帝党和改良派的明显结合是强学会，无论是北京或上海，强学会的成员中都有帝党。从北京强学会来说，帝党的主要成员沈曾植、沈曾桐、文廷式都列名参加。沈曾植且有“正董之名”<sup>②</sup>，等到强学会被劾、封禁事起，他又有“图复意”<sup>③</sup>，仍主“恢复”<sup>④</sup>。胡孚宸请改为官书局，沈又多方奔走，力促其成<sup>⑤</sup>。沈曾桐是北京强学会的“发始”者，有“副董之名”<sup>⑥</sup>。强学会被封禁，仍主恢复。强学会改为官书局，他主报务<sup>⑦</sup>。文廷式强学会成立时，有“副董之名”<sup>⑧</sup>，后又主持官书局选书事<sup>⑨</sup>，由于他是帝党的骨干，致为后党杨崇伊所劾。陈炽，也是强学会发起人之一，任“提调”，有“正董之名”<sup>⑩</sup>，屏除李鸿章入会，且责翁同龢“因循”<sup>⑪</sup>。至于翁同龢，则强学会筹议时，梁启超曾往请谒。《翁文恭公日记》中也有关于强学会的记载，如：“申正归，沈子封来，南城因封禁强学会，众汹汹，有烦言”<sup>⑫</sup>。他

① 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》“光绪二十年甲午”。

② 汪大燮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，见《汪穉卿师友手札》，上海图书馆藏；又汪大燮同年十月初三日《致汪康年书》谓其原为“总董”。

③ 汪大燮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年腊月二十七日。

④ 吴樵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。

⑤ 同上。

⑥ 汪大燮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⑦ 吴樵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。

⑧ 汪大燮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⑨ 吴樵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。

⑩ 汪大燮：《致汪康年书》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⑪ 《翁文恭公日记》第34卷，第75叶：“归得陈次亮函，责余因循，其言痛切”。

⑫ 同上，第34卷，第124叶。

和梁鼎芬、沈曾植、文廷式深有关系，故谭嗣同《致汪阳中鹤书》称：“康南海倡为强学会，主之者，内有常熟，外有南皮”<sup>①</sup>。

至于上海强学会，帝党列名的主要人员有黄体芳、黄绍箕、黄绍第、张謇等。黄体芳甫从开封来到南京，主讲金陵文正学院，黄绍箕、绍第则为其子。康有为来到南京，说“张香涛开强学会”时，曾与黄绍箕“议《章程》，出上海刻之”<sup>②</sup>。张謇在 1895 年接到梁鼎芬电文后，参加了强学会。由于张之洞时署两江总督，上海强学会成立前，康有为曾向他游说开会，张的幕僚梁鼎芬等还和康有为同赴上海“开会”，所以上海强学会中也有张之洞幕僚。张之洞虽不能称为帝党，但他本是前“清流”，甲午战时也主战、拒和，和李鸿章又有矛盾，与帝党又有一些共同点，从而支持开会。又由于他的改革主张和改良派毕竟有别，所以后来又“背盟”。

强学会的成立，改良派和帝党的结合，推动了各地的设立学会和发行报刊，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，也引发了后党的不满和反击。

改良派的上书，后党屡屡用“拒收”、“斥退”来阻挠，帝党的活动，更引起后党的不安。后党决定削弱帝党，摧毁改良派，从而在 1895 年 12 月 3 日，先把翁同龢的亲信吏部左侍郎汪鸣銮、户部左侍郎长麟，以“上年屡次召对，信口妄言，迹近离间”罪名，革职永不叙用。翁同龢虽“固请所言何事”，也已来不及了<sup>③</sup>。接着，又由李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出面，劾责强学会，迫使解散。次年春，杨崇伊再次出面劾奏帝党的中坚、北京强学会的重要人物文廷式，以“遇事生风，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，互相标榜，议论时政”等罪名，迫使文廷式“革职永不叙用，并驱逐回籍”<sup>④</sup>。

后党准备借此机会“尽逐”帝党骨干，汪大燮《致汪康年、诒年

① 《谭嗣同全集》，三联书店 1954 年版，第 332 页。

② 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“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，三十八岁”。

③ 《翁文恭公日记》“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”。

④ 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第 384 卷，第 2 叶。

书云：

“又正月十三停毓庆宫；十四，杨崇伊为合肥访查台胞弹劾东事之人，开一清单，凡三十余人。十五、六，合肥又独诣长信呈之。十八，杨即以弹芸阁章就正合肥，合肥将行有言：‘若辈与我过不去。我归，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？’至津，又告人云：‘劾我诸人，皆不安矣。’其三十余人之单，德使亦有之，大约各署皆有，惟见其单者，则由德使给阅也”<sup>①</sup>。

张謇在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：

闻二月李鸿章临使德时，请见慈宁，折列五十七人，请禁勿用，第一即文道希。李出京，而御史杨崇伊弹道希之疏入矣。杨，李戚也。又闻慈宁为穀庙（同治）立端王之孙傅伦为子。瞻念北辰，忧心如捣。告者曰：“五十七人之中，子名殊不后”。

他不仅点出李、杨关系，而且谈到废立阴谋。

后党对帝党的打击，反而加速了变法的步伐。帝党为了自己，只有联合改良派；改良派为了争取光绪，也只有依援帝党。张謇在听了上述消息后，先后与沈瑜庆、郑孝胥等“纵谈周昌、贾谊、萧望之等以论常熟”，希望翁同龢尽力辅佐光绪。而对后党的进攻，光绪在翁同龢的影响下“颇诘问时事所宜先，并以变法为急”，奕訢默然不语，翁同龢“颇有数对，谓从内政根本起”<sup>②</sup>。所谓“内政根本”，就是变法改制。翁同龢深知要变法，就要联合改良派，认为康有为、梁启超有“经世之才，谋国之方”，“冒万死而不辞，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”<sup>③</sup>，曾密荐康有为了于光绪。1898年1月24日，光绪命五大臣延见康有为了总理衙门，荣禄、李鸿章责询康有为时，翁同龢为之回护。第二天把康的建议转告光绪，于是命康有为条陈所见，进呈《日本变政考》等书。改良派更是创办报刊，大造舆论；集会“保国”，大造声势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。

后党破坏保国会，奏请查封保川、保滇、保浙等会，帝党和改良

① “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灯下”写。

② 《翁文恭公日记》“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”。

③ 张子扬：《关于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》，《光明日报》1955年7月21日。

派也不示弱，保国会未遭封禁。5月20日，奕訢病死，于是“事皆同龢主之”，加速了变法的步伐。改良派鼓动帝党请求光绪“诏定国是”，翁同龢部署变法具体设施，6月10日，张謇亲眼看到翁同龢“所拟变法谕旨”<sup>①</sup>，帝党和改良派结合起来，争取了一个没有实际权柄的光绪皇帝，“诏定国是”了。

甲午战后，翁同龢和帝党主战、拒和，是爱国的举动；和改良派相结合，促使了变法的实现。对这一时期的翁同龢和帝党应予肯定，不能因其是“统治阶级”而忽之。

（责任编辑：谢维）

（作者汤志钧，1924年生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）

---

① 《张謇日记》“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”。